

萨孟武

作品系列

中国社会政治史

隋唐五代卷

萨孟武

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萨孟武……………作品系列

中国社会政治史

隋 唐 五 代 卷



萨孟武

著

Copyright ©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社会政治史.隋唐五代卷/萨孟武著. 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9.1

(萨孟武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108-06261-1

I. ①中… II. ①萨… III. ①政治制度—历史—中国—隋唐时代
②政治制度—历史—中国—五代十国时期 IV. ①D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4975 号

著作财产权人:©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(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除外)独家出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散布、销售。

版权所有,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,禁止对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、机械、影印、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。

责任编辑 杨柳青

封面设计 储平

责任印制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 印张 30.5

字 数 438 千字

定 价 89.00 元



萨孟武(1897—1984),名本炎,孟武为其字,福建福州人,著名政治学家。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士,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教授。1927年,任国民党总政治部宣传处编辑科科长。1928年,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官兼编辑部主任。1930年,任中央政治学校普通行政系教授。越一年,兼任系主任,另兼陆军大学教官、中央学校教授。抗战军兴,随政校上庐山,抵芷江,入重庆。国民参政会成立,遴选为参政员。抗战胜利后,历任中山大学、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兼院长。政校复校,兼任政治系研究所教授,并曾任立法委员。著有《政治学》《西洋政治思想史》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《新国家论》《中国宪法新论》《〈西游记〉与中国古代政治》《〈红楼梦〉与中国旧家庭》《〈水浒传〉与中国古代社会》《孟武自选文集》等著作。

出版说明

作为著名的政治学家、法学家，萨孟武先生著作甚多，以《政治学》《中国社会政治史》《中国法治思想》等最为著名。而由于种种原因，其社会学、政治学著作多在台湾出版，大陆读者接触和认识萨先生，更多是通过他的三本学术性随笔著作，即《〈红楼梦〉与中国旧家庭》《〈水浒传〉与中国古代社会》和《〈西游记〉与中国古代政治》。这对于认识与评价一位严肃的学者，显然是十分片面的。鉴于萨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、制度、理论的研究能不落俗套，深入浅出，贯通中西，对中国政治学的形成影响很大，所以此次拟出版其“作品系列”，主要选取其未在大陆出版的著作。

首先出版的《中国社会政治史》全书共四册，纵论中国历代之兴亡得失，除考据政治制度外，更引用社会、经济、思想等各层面的相关资料，以评析这些层面的变动如何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，乃至最终成为朝代更迭的因素。

本书之所以名为“社会政治史”，而不同于其他社会史或政治史之处就在于，其揭示了社会科学 with 政治史的密切关系；剖析了各类社会情况，如民风、士气、经济、国防、户口之多寡、土地之分配与生产力、各种阶层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，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，以着力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。以政治与社会两方面的交互

影响为决定历史演进的条件，作者编写时以其研究心得为骨干，广泛引用原典古籍为血肉，历数先秦到明朝的社会政治发展。书中除了详述宫中、府中权力的转移、倾轧外，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，介绍币制、税赋、力役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，及其如何冲击历史的演进。最便利学者的是，书中于论述每朝政治制度时，以表格方式详述其中央、地方官制与文官制度，且剖析该制度之优劣。

本书实际写作共花费二十二年。为成此书，萨先生博览群书，正史以外，通鉴、奏议、书信等各种史料，多有参考。亦不惜斥资购入数套《二十五史》以备查核、编辑之用，其准备工作十分详尽，故自成书以来，已成为研习中国历朝政治的重要参考书籍。此次首次在大陆出版，相信一定能为这里的政治史与社会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。

简体版序

萨孟武先生(1897—1984)对我而言是上一世代的学者,我和萨先生素昧平生,虽都留日,但背景完全不同。萨先生学术经历丰富,论教职,曾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、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。其著作等身,著有《政治学》《新国家论》《中国宪法新论》《中国社会政治史》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《西洋政治思想史》等,甚至分别探讨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与中国社会、政治的关系,视野广阔,学贯中西,影响深远。

其中《中国社会政治史》四册,是我在台大讲授“中国通史”“隋唐史”等课程时必备之参考著作,同时也推荐给学生(含研究生)。台湾在解严(1987年7月15日解除“戒严令”,简称“解严”)以前,情势严峻,研究历史极为困难。萨先生卒于1984年,其《中国社会政治史》四册由三民书局出版最晚之时间为1979—1980年,足见萨先生之治学均是在极为艰困的环境下进行的。从写卡片到剪贴等工作,我个人也都经历过,最感缺憾的事,就是不易参考到境外学术研究成果,尤其是当时大陆的最新考古资料。这是美中不足之处。

台湾在1972年以后,“中国通史”被规定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。当时最通行的教本,就是钱穆《国史大纲》上下两册、傅乐成《中国通史》上下两册。钱书简明扼要,

句句经典，但文言书体，对大一学生而言，不免艰涩。傅书白话解说，详尽流畅，资料最新，成为最畅销书，但缺乏萨先生一向重视的因果关系分析。萨书四册自1962年初版，至1965年出齐，除解析详细外，兼有原典详注，独具慧眼地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，皆为前两书所无。对教师而言，是极佳的参考著作。相对地，对大一学生而言，负担较为沉重，但对研究生及中国断代史课程的学习则甚有助益。可惜至萨先生过世时，仍未能完成清代部分。若要了解萨先生此套书之思维、写作方法与过程，宜参阅《增订新版自序》。此序写于1975年3月1日，先生时年79岁，在序文说预定五年之内完成清代部分，此时距其过世还有十年。结果未能如愿，殊为可惜，实是学界的一大损失。

《中国社会政治史》第一册从先秦至两汉，共出四版；第二册三国至南北朝，共出四版；第三册隋唐五代，共出三版；第四册宋元明，共出三版。每册各有序文，每版都有修正增补，治学态度严谨，值得后进学习。萨先生在《增订新版自序》中说：“研究历史必须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”，以及时代之制度、思想等。他认为“世界上最坚强的莫如我们中华民族”，其向北、向南发展是历史使命。在研究资料方面，重视正史、会要以及文集、笔记等，但对实录则认为太过芜杂，只能补充正史不足，“正史已经有了，何必引用实录”。“名为实录，事实上所录者老早就非‘实’了。”就这一项而言，治史者恐未必都能赞同，盖实录仍可纠正正史，其价值应在正史之上。

《中国社会政治史》这套书每册都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问题，例如第一册提出“自周平王东迁之后，中原王朝常受漠北蛮族的压迫。这不是因为中原王朝文弱，而是因为中华文化进步。何以说呢？中原王朝到了周代，完全进化为农耕民族，而漠北民族还是游牧民族”。游牧民族“看到近邻的农耕民族财物丰富，当然发生羡慕的情绪，他们喜欢侵略，可以说是一种天性”（第三章第四节，第170页）。这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何以南侵的大问题。萨先生的解释固然是重要理由，但若仔细再思考，应该还有其他因素，例如气候变化、人口增减、内部斗争等问题，都需要一并考虑。

第二册提到东晋累次北伐不能成功者，是由于“军队缺乏与财政困难，而

军队所以缺乏，财政所以困难，又以编户减耗为其主要原因”（第二章第二节，第179页）。但仍可进行另外的考量，如热衷北伐者不是晋室近戚，就是寒门出身，士族则保家重于保国，上下离心，常出现后勤补给不足，自易功败垂成。

第三册第二章第四节开头指出：“国家的治乱固然悬于人心的振靡，而人心的振靡又悬于制度的良窳。”此事举战国时代的秦国，人心最靡，“贪狠强力，寡义而向利”。经商鞅变法，使秦能够统一六合，成就帝业。所以“讨论朝代兴亡，与其研究人心，不如研究制度”（第153页）。这个说法很有创见，但恐怕也是见仁见智。以商鞅变法而言，如果没有法家思想先做指导，何来制度？又如果没有秦王赞许支持，何来变法？前两者仍与人心有关。制度属于实际履行的表现，而制度的规划与内容，又必须系乎当时人心所向，才能有效执行，所以人心与制度不必一定要取其一，两者兼顾仍然需要。

第四册指出“五胡乱华以后的汉族已与秦汉时代的汉族不同。它是混合亚洲许多民族而成的中华民族。中华民族血统上虽然不是汉族，精神上仍秉承汉族的思想。他们的胸襟是宽大的，只要异族接受中华的文化，就视为同一民族，不分彼此，而有平等的私权及公权。汉武帝临崩之时，受遗托孤者有匈奴人金日磾。安史作乱出师勤王者，有契丹人李光弼。黄巢作乱，朱温篡唐，此时志复唐祚者乃是沙陀人李克用。阿保机入据中原，而兴师讨伐，迫使辽主不能不北归者，又是沙陀人刘知远”。“这与今日各国对于肤色之有偏见，甚至垄断地区，不许有色人种移住其间者自不相同。”（第二章第二节，第251页）这就是所谓文化中国论，的确如此。

最令人感兴趣的议题：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成长，究竟是在纷乱抑或和平时期。这个问题，也常成为学校考试的申论题。钱穆《国史大纲·引论》指出：“今于国史，若细心籀其动态，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，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。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。”“中国史如一首诗，西洋史如一本剧。”“即以人物作证，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，耶稣死于十字架，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，晨起扶杖逍遥，咏歌自挽。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，其景象不同如此，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。”“中国史上，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，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，而非有意义的划界线之进步。”这是钱

先生的和平论。但萨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,他说:“分乱之在中国,不使中华民族衰亡,而使中华民族膨大,由黄河流域发展至长江流域,再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闽粤桂黔,最后竟然殖民于南洋群岛,所以分乱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,是有间接作用的。此只就闭关时代言之,海禁开通,一个民族不能统一,国力消耗于内乱,结果只有灭亡。”(第三册第三章第三节,第452页)从其前后文看来,此处所谓的“分乱”是指传统时期,“海禁开通”是指近代,所以钱、萨两位先生对传统时期纷乱现象的批判是截然不同的。何者为是,有待读者进一步思考,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所说的都有部分道理。

以是诸册问题讨论之荦荦大者,其问题意识极为活泼、精辟,又具宏观视野。虽是三四十年前的著作,至今仍值得吾人细嚼品尝,从中习得历史知识,尤其是后进学子,特为推荐。

台湾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

高明士

2017年1月15日

增订新版自序

本书起草于抗战前二年，即 1935 年。第四册完成于 1965 年，合计共三十年。中间有八年，将时间花在政治学的著作及修改，实际本书之写作共花二十二年。

最初一、二两册，即由先秦至南北朝，抗战时，曾摘编为讲义，发给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学生。由 1944 年至 1946 年又着手写作唐代。

抗战胜利，我赴中山大学，主持法学院院务。在两年（1946 年至 1948 年）之间，一方编述五代部分，同时着手搜集宋代资料；1948 年我来台湾，主持法学院院务，开始写作宋代部分。宋史写成之后，陆续搜集资料，着手写元明二代。明代写完之后，我不敢遽尔出版，又将第一册及第二册加以修改又修改。友人林纪东先生谆谆劝我付印，意谓万一失掉，未免可惜。于是就于 1962 年之冬，先出版第一册及第二册。

第一册除 1944 年在重庆出版不计外，1962 年 11 月初版，1966 年再版，1969 年三版，1972 年四版。第二册于 1962 年 12 月初版，1966 年再版，1970 年三版，1972 年四版。第三册于 1963 年 12 月初版，1966 年再版，1968 年三版（因多印，故未四版）。第四册于 1965 年 11 月初版，1968 年再版，1971 年三版。1974 年物价忽然大涨，因之各册虽将售罄，均停止付印。

本人著作之所谓“版”与国内各书之“版”不同，必有修改。其不修改者只称为“刷”。例如拙著《政治学》，名为四版，其实，初版四刷，再版二刷，三版一刷，四版十五刷，共计二十二刷。未曾修正改版，而称之为再版、三版……这是各国所没有的。

我在小学时，除算术、国文外，对于中国历史极感兴趣。后来阅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总觉得其对于社会情况，如民风、士气、经济、国防、户口之多寡、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、各种阶层之分立，以及政治制度等等，写得太少，而且未曾说明这许多要素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。研究历史必须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，单单记忆事实，尤其用尽脑力，去暗记小事实，不但记得之后，旋即忘记，而且一点用处也没有。这是我写本书的动机。

我写作本书当然是先搜集资料，而要搜集资料，必须脑中已有一种观念，依此观念，做成每朝历史的目录，而后依此目录，去搜集所需要之资料。否则一部《二十五史》看了又看，也必毫无结果。

搜集资料先由正史开始，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。例如《后汉书》，我前后看了三遍，一字一字地看下去。第一次觉得毫无资料，第二次略有所得，第三次才有收获。南北朝历史分量极多。《宋书》不错，《魏书》固然芜冗，而资料还不少。《南北史》只能作补充之用，至于《北齐书》《南齐书》等等只是族谱及升官图。没有什么好的资料，而又不能不看。正史看完，再看会要（《西汉会要》根本不必看）或会典，最后才看文集及笔记。文集固然分量甚多，但其中大部分是诗赋记铭。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，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，即可知道，值得吾人参考之用的奏议及书信并不甚多。所以文集容易看，也看得很快。笔记固然有很好的文章，然每种笔记之中，合于本书需要的也很有限。至如《愧郟录》《梦溪笔谈》之类，不过五六篇可供参考。又如读者所熟知的《日知录》共有三十二卷之多，其中除八、九两卷之外，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，或五六篇可用，或全卷都不可用。这不是说其余各篇没有价值，而是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没有用处。

以上所述只就初版言之。学问本来没有止境，读书愈多，资料亦愈多，因之再版、三版、四版付印之时，无不增加字数。字数增加，又须改排。但全书

改排,不是个人财力所能负担。故凡某一页字数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,只改排该页,而增加其行数。字数增加太多者,则在该页上,加一、二、三等。例如第一册二十七页,共增加八页,遂于二十七页处改为“二七一”“二七二”……“二七八”;三十四页亦增加九页,故改为“三四一”……“三四九”。倘若三版或四版时,又增加字数,如在“三四一”及“三四二”两页,则由十八行改为二十一行。

写作历史,不消说举证极其重要。但既有“全称”之例,就不必再引特称之例。万不得已而须引用特称之例,亦不可引得太多。太多,读者必感头痛,而认为资料的堆集,反将显明之事变为暧昧。现今学者喜欢引用“实录”,实录太过芜杂,它只能补充正史之不足,正史已经有了,何必引用实录。何况自史官失去独立地位之后,实录未必据实而书,其受当时政治势力之影响者未必比正史为小。名为实录,事实上所录者老早就非“实”了。

我有一种野心,意欲改写会要,改编会典,不但各种事实,即当时名臣学者之言,亦宜编入。这种工作当然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做到。

本人著书,喜欢修改,修改到主观上认为满意之时,才肯罢休。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读者之提议。例如读者来函,多谓第二册与其他三册比较之后,分量稍轻,余亦深有此感。故自1971年始,又开始修改全书,尤其增加第二册之分量,务使四册分量大略相等。兹应告知读者的,本书新版由第一册至第四册无不修改,其修改页数每册均在一百余页以上,各册增加资料不少,页数自亦随之增加。

本人接到读者来函不少,他们提出两种希望:一希望改用较大之字排印,纵令“售价提高,读者不会计较”;二希望“继续完成清代部分的写作”。关于第一希望,非本人财力所能负担,幸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于1975年之春提议愿意承印是书,故自本年始,改由三民书局从新排印。第二希望大约可以实现,因为本书既由三民书局承印,则本人不拟再作修改,而当致力于第五册之写作,预定五年内出版。

本书第一册初版之序,已经提到,当物价低廉之时,著者为节省时间起见,卡片之做成,不用抄写,而用剪贴。1946年复员时,著者全家坐飞机回到

东南，除本书原稿及随身衣服之外，一切均委托中央政校运送。而政校竟将余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内，行至三峡，不知因何原因，全部沉入江底，财产损失，固不足惜，所可惜者十数年搜集之资料卡片全部毁没。

来到台湾之后，不得不购买艺文社出版之《二十五史》两部及各种文集各三部（两部剪贴，一部保留）再行阅读一遍。我虽然没有一目十行的本领，但却能一字一字地快读下去。有人问我，《二十五史》之中，哪一史写得最好？依我管见，《汉书》最好。《汉书》列传不是依官之大小，而是依事之有无，而事又与国家治乱、典章制度、士风民气有关。李广不得封侯而有传，其从弟李蔡做过丞相而无传。刘屈氂不过平凡之人，《汉书》所以有传者，盖欲借他说明三事。一是汉制，宗室不得典三河，而屈氂乃为丞相。二是汉时郡守多先为三辅，次九卿，次御史大夫，最后才为丞相，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跃而为左丞相（这又暗示武帝要恢复左右丞相之制）。三是戾太子反时，屈氂不敢发兵，武帝曰，丞相无周公之风矣，周公不诛管蔡乎？这又可以证明丞相对于紧急事变，有急速处分之责任。司马相如、扬雄两传之赋与历史虽无关系，而后人观此亦可知道当时赋之体裁。唐时举官试“判”，新旧《唐书》未载“判”之文体。明代举士用“八股”，《明史》亦不举八股之例。这种重要的文章体裁应该举出一篇，留给读史者参考。当然，《汉书》也有缺点，以桑弘羊那样重要的财政家，竟不立传，唯于《食货志》中，稍稍提到。如果没有《盐铁论》一书，吾人将无从知道桑弘羊的思想。从来学者多谓《晋书》好采诡谬碎事，其实这种诡谬碎事往往可以说明当时社会风气，而知晋祚之不长。列传与墓志铭不同，墓志铭可写个人的私事，列传所写的，必须该事与整个社会有关，或该事可以说明社会的结构、政治的状况、经济的情形，以及士风民气等等。

研究历史，尚须知道时代思想。思想不能领导历史发展，反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。春秋战国之时何以各种学说杂然并兴，这必有其时代原因。秦崇法家，西汉初年盛行道家与法家的思想。元成以后，儒家才见抬头。王莽变法，完全根据儒家学说。到了东汉，儒家又参以阴阳家的思想。魏晋之世，学者祖述老庄，然而吾人观当时人士的行动，绝不是道家的思想，而是杨朱的快乐主义。唐宋二代，如韩愈、司马光极力推崇君权，由元至明，《四书》及朱熹

的地位忽然提高,其故何在?明代中期以后又发生了反动思想,如王阳明的学说,尤其李卓吾之反对道学。明末清初之黄梨洲复反对君权,这均有其历史的原因。本书对此思想均稍加叙述。且进一步,说明某一种思想所以流行于某一个时代的原因。

现今五族共和,历史学者不宜囿于成见,再用胡虏等各种名称,自行分裂。今日之汉族已与秦汉时代及秦汉以前的汉族不同,它是融化亚洲许多种族而成的中华民族。余本欲用“种族移动”以代替五胡乱华等等。因文稿已定,更改不易。但我们要知道每次种族移动之时,中华民族一方同化外来的种族,同时向南发展,而扩大中华的版图。世界上最坚强的莫如我们中华民族。天降大任于中华民族,我们起码须向北发展,完成此种使命。

本书关于制度方面,重要的固然详细说明,不重要的均舍而不谈。多谈,徒乱人意,反令读者不能认识一代政制的根本精神。但制度必与时代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,而制度之良窳对于政治之隆污又可给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比方禄俸,西汉的官秩是十五级乎,抑是十八级,花了许多时间去考证,著者认为空费精力。本书所注意的是将最低的禄,一与农民收入(百亩农夫,盖禄所以代耕,因此又须知道当时农业生产力)比较,二与一般工资比较,由此说明禄俸与国家治乱的关系。

社会科学与历史有密切的关系,研究历史而不了解社会科学,往往顾到部分,而忘及全体。反之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常能由全体以观察部分,再由部分以观察全体。而全体又放在时间(时代)与空间(环境)之内。一个变化了,其他亦必变化。部分可影响全体,全体又影响部分。时代可改变事物,事物又可以变更时代的精神。环境可改变事物,事物亦可以变更环境的需要。而时代与环境又会互相影响,改变彼此的性质。欧洲社会科学家对于历史均有深刻的研究,而研究历史的人对于社会科学亦有深刻的了解,吾人读各种名著,即可知之。单单知道历史,而未读过社会科学各种书籍的人,往往不识轻重,轻者说得详之又详,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又舍而不谈,如斯著作不过历史之杂货摊而已。

本书引文均注明出处,详载哪一书、哪一卷、哪一篇,所注皆放在引文之

下。此不但减少纸张的浪费，且节省读者的时间，不必去翻数页或数十页之后，查看注释。但所注文字太长，则放在该段原文之后。此与今人著作喜将注释放在每篇或每节之后者不同。又者本书引文所以详注哪一书、哪一卷、哪一篇者，盖谋读者的便利。例如《新唐书》共有二百二十五卷，有些卷复分上中下，每卷之中有许多列传，如果只写《新唐书·杨炎传》，阅者非翻尽《新唐书》目录，必难知道其在第一百四十五卷（《旧唐书》第一百十八卷）。著作人不过多写几字，而读者得到便利不少，我不知国内学者何以吝此数字不写。至于页数不必写出，因为古书版本太多，而各人、各图书馆所藏古书之版本未必相同。

1975年3月1日序于狂狷斋

序

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外祖父，我叫他公公。公公要我为一本书写一篇序，我现在还是中学三年级学生，历史读得不多，这本书的价值如何，我没有资格批评，我也不敢写。公公一定要我写，我只有将妈妈告诉我的，及我亲眼看到的，写下作序。

妈妈告诉我，她进小学时，就知道公公已经在写这本书了。公公喜欢写作，他写作前一定先起稿，往往是改了又改，字又写得太草，草到变成符号，别人看不懂，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，所以无法请人抄正。这本书引用古书很多，凡用古书的地方，都用剪贴的方法，以节省时间。妈妈最初以为写作不难，只要有一把剪刀、一瓶糨糊就可以了。妈妈又告诉我，公公写作，不需要环境清静，在重庆南温泉时，最初一年半，住在旅馆中，吃睡都在同一间房子里，并且妈妈同两位舅舅又常在此玩闹，公公不管如何吵闹，也不会分心。

我生在台湾，由小学到中学，公公教我语文、数学，也教我英语。公公教书不用别人写的课本，而由自己编著。现在这几种讲义还保藏在我的家中。我寒暑假常住在公公家里，公公修改这本书，似乎花去不少的时间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是消遣，不是自讨苦吃。”我半夜醒来，常常看到公公写作，我问他：为什么不睡觉？他说：“现在灵感来了，